

■ 曹清华 著

词语、表达与 鲁迅的“思想”

楊青范先生
大指係著
為張子牛
——魯迅

中山大學出版社

■曹清华 著

词语、表达与 鲁迅的“思想”

中山大学

曹清华 (1981—1936) 曹清华 (1981—1936) 曹清华 (1981—1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50874号

出版人：张元
责任编辑：张元

责任编辑：张元

封面设计：张元

责任校对：张元

责任印制：张元

出版发行：张元

地址：张元

电话：张元

邮编：张元

网址：张元

电子邮箱：张元

印刷厂：张元

规格：张元

字数：张元

印数：张元

责任编辑：张元

封面设计：张元

责任校对：张元

责任印制：张元

出版发行：张元

地址：张元

电话：张元

邮编：张元

网址：张元

电子邮箱：张元

印刷厂：张元

规格：张元

字数：张元

印数：张元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词语、表达与鲁迅的“思想”/曹清华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306 - 03284 - 3

I. 词… II. 曹… III. 鲁迅 (1881—1936) —思想评论
IV. I210. 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9874 号

出 版 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嵇春霞

封面设计: 贾 萌

责任校对: 陈 霞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南海印刷厂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 × 1230mm 1/32 8.25 张 2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题《呐喊》

鲁迅

弄文罹文网，
抗世违世情。
积毁可销骨，
空留纸上声。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表达与心声	(24)
1. 声音、言辞、文字	(24)
2. 心声/内曜	(29)
3. 个人、主观与意力	(36)
4. 摩罗与力	(39)
第二章 权力者的表达	(46)
1. 中国书、圣武	(46)
2. 经/“玩艺儿”	(53)
3. 推背图、主义	(61)
4. 革命文学	(73)
第三章 表达与自己的写作	(81)
1. 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81)
2. 看	(88)
3. 真的人	(92)
4. 梦/希望	(99)
第四章 表达与身体	(105)
1. 行与言	(105)

2. 头发、胡须、脸、梅兰芳	(111)
3. 牺牲与复仇	(116)
4. 血写的书	(125)
 第五章 表达者的位置	(130)
1. 帮忙、帮闲、扯淡	(130)
2. 民魂	(136)
3. 革新/革命/战斗	(143)
4. 破坏与建设	(151)
 第六章 表达与无产者	(162)
1. 哑与开口	(162)
2. 傻子、愚人、无产者	(167)
3. 无产文学	(176)
4. 革命人/斗争者	(181)
 第七章 表达的困难	(185)
1. 写/说	(185)
2. 心与口	(198)
3. 导师	(202)
4. 药方与出路	(207)
 附 录	
表达及其困难	(211)
左翼福柯眼中的民众	(225)
 参考文献	(239)
 后 记	(243)

引 言

一

鲁迅的“思想”是一个老题目，也是一个世纪难题。

围绕这个题目，一面是绵延不断的追问和质疑——鲁迅有什么主张？鲁迅的“出路”呢？这些疑问已经延续近百年。

比较早的要算钱杏邨与梁实秋。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 Q 时代》写于 1928 年。他认为用“呐喊”与“彷徨”这两个词就可以把鲁迅说明白——“他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出路，始终的在呐喊，始终的在彷徨……我们从鲁迅的创作里所能够找到的，只有过去……是没有将来的。”^①

与钱杏邨侧重批评鲁迅的小说不同，梁实秋的论述主要针对鲁迅的杂感。1929 年，他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质疑——“你不满意于别人的主张，你自己的主张呢？自己也许没有能力指示改善现状的途径，但是总该按捺住一时的暴躁，静心的等候吧？”文中，梁实秋对这“不满于现状”者的心理颇下了一番解剖的工夫，不妨抄录如下：

“不满于现状”者，即是觉察出现状有毛病也。有了毛病还不能觉察，这固然蠢；有了毛病还要隐密，这固然险；但是有了毛病，发觉之后，声张之后，不求医治之方，这还是一样

^①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鲁迅书信注释组编（1997 年）：《“雨剿”鲁迅资料选编（1927～1936）》（未出版），第 58 页。

的蠢，一样的险！所以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素有“先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的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开药方当然不易：各人有各人的师承源流，各人有各人的习惯训练，病象容易看，病源便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下药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方案。三民主义是一付药，共产主义也是一付药，国家主义也是一付药，无政府主义也是一付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付药，当然那付药对症，那付药稳妥，这又是一件事。真关心现状的人，没有不想法寻找一个最好的药方而劝病人服下的。

但是，人的脾气真不得一样。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付药太冷，那一付药太热，这一付药太猛，那一付药太慢。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这可是什么心理呢？^①

1933年，《中央日报》上一篇题为《杂感》的文章，几乎重复了梁实秋的疑问——

我们村上有个老女人，丑而多怪。一天到晚专门爱说人家的短处，到了东村头摇了一下头，跑到了西村头叹了一口气。好像一切总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问她到底要怎样呢，她又说不出。我觉得她倒有些像鲁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问他究竟的

^① 见《新月》1929年9月第二卷六、七期合刊。

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①

同一年，再有“戚施”在《大晚报》发表《钱基博之鲁迅论》，其意见甚至用语均与钱杏邨相类似——“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②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读2000年王朔与冯骥才在《收获》上刊出的讨论鲁迅的文章，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王朔的《我看鲁迅》一文专辟一章质疑鲁迅的“思想”——

那些经常用于称赞他的话其实不属于思想，只是夸他的为人或说高贵的德行，拜倒在他的光芒之下那么久其实我对他的思想一无所知。从他无数崇拜者的文章中我也想起谁说过他有思想，大家纠缠、感慨、为之涕下、激动不已的大都是他的品格，最厚道的文章也只是对他可能具有的思想进行猜测，想象这样一个为世不容、痛苦敏感的智者内心一定是“漆黑一团”，这个逻辑似乎是说，对生活、社会、人群极度绝望本身就是深刻的思想。我不是太明白这个逻辑，坦白说，直到昨天，写到这里，我还是晕菜，不知道鲁迅思想的精髓到底是什么。^③

王文看上去十分谨慎，实际上他追问的方式仍旧不出梁实秋的旧路，他想了解的“鲁迅思想的精髓”不外乎梁实秋的质疑——“你自己的主张呢？”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也同样如此。他认为，鲁迅“创造性”的国民性批判，实际上“源自西方传教士”、“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只因鲁迅的小说太出色了，所以

① 见《中央日报》1933年11月16日。

② 见《大晚报》1933年12月29日。

③ 转引自高旭东编《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下引《世纪末的鲁迅论争》均出自这一版本，不再另注。

“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在事实上，倘去除冯文中这些多少有些牵强的“西方中心主义”及“传教士”的词汇，我们就会发现，冯文的锋芒所指是他在文中所说的鲁迅“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中心主义地”没有看到中国人的“优根性”，却一味批评出现在西方人的瞳仁里的中国人的缺点。

最近，摩罗的一篇文章有关鲁迅的论述便沿袭了这一批评思路。他认为，在“鲁迅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作家的国民性批判实质上是“一种‘自虐’倾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他呼吁国人“及早从这种自虐倾向中摆脱出来”，因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而且“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①等等。

把这贯串近一个世纪的质问的声音汇集到一起，显而易见，所谓的“不满于现状”、“讽刺与冷嘲”、“愤慨”、“国民性批判”、“自虐”，尽管用词不同，着眼点却相当一致；同样，他们所要求的“出路”、“药方”、“建设将来”、“制度建设”也基于相通的思考方式——“知识分子”乃“方案”（药方与出路）的设计者或阐释者；“思想”的意义也在此。

二

与这追问和质疑相映衬的是研究者对“鲁迅思想”的近百年探索。其中一条重要线索就是从“鲁迅思想”中寻出路，找方向。

瞿秋白有一段为我们熟悉的论述。这段话人们往往重视了前半段，并且概括为“两段论”，以凸显鲁迅阶梯式的思想发展轮廓。

^① 摩罗：《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南方周末》2008年6月4日。

而实质上，这一段文字的着力点却在后半段所引鲁迅的原话——“以为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瞿秋白要强调的就是这“将来”，亦即鲁迅向人们所昭示的一条明确的“出路”。同样，1937年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要阐明的也是鲁迅对于“出路”的意义。所以，他强调，鲁迅的首要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的评价也是基于同样的话语策略，其重点不在鲁迅“三大家”的历史定位，而在于用鲁迅来例证他所描述的中国文化的方向。

“两段论”和《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的评价在其后数十年间得到了研究者的进一步阐发。从鲁迅作品中找“出路”和“方向”，并叙述它与取得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新民主主义”知识系统的互相呼应与印证关系，是这一类研究的共同特色。

这一研究倾向在20世纪80年代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有：“回到鲁迅那里去”；“探讨鲁迅的实际思想”；“回到鲁迅本体”；“鲁迅本原思想探究”；等等。批评者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把鲁迅的作品当做某种现成的、已有的政治理论的注脚，其结论背离了鲁迅作品的实际。所以，鲁迅研究的第一要义就是还鲁迅以本来面目。然而，从鲁迅思想中寻出路、找方向的思路在这后来的研究中仍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

先看王富仁1986年出版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部著作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呐喊》与《彷徨》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描写生活”，“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而且，这面镜子反映了“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以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

这个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传统封建思想。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思想在以农民群众为中心的广大人民

群众中的广泛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影响，它的重点应放在束缚人民群众最厉害，并给他们精神发展带来极大损伤的封建等级观念和残酷、虚伪的封建礼教、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上。^①

稍后，王富仁又发表《从“兴业”到“立人”——鲁迅早期的文化思想》一文，专门讨论鲁迅早期的思想。这篇文章强调了鲁迅写于日本的论文《文化偏至论》对于鲁迅个人乃至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意义，认为正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找到了中华民族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走向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一条必经的狭窄孔道”^②。回到前面讲到的梁实秋对鲁迅的“没有能力指示改善现状的途径”的指摘，王富仁对于“方法、途径”与“孔道”的论述多少就有些回应的意味了。

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1988年出版。钱理群在书中倡导“把‘个人’的鲁迅与‘民族精神代表’的鲁迅、‘人类探索真理的伟大代表’的鲁迅三者统一起来”。事实上，这里的“民族精神代表”与“人类探索真理的伟大代表”也有着“出路”与“方向”的含义。这部著作所宣称的新的研究视野——“（鲁迅）在探索民族变革、复兴道路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以及鲁迅怎样从‘内心的炼狱’中挣扎出来，找到正确的道路。”^③——同样嵌入了“找出路”的分析框架中。

最近，张梦阳撰文指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是鲁迅“真正的本原思想”。他列举的理由是：其一，这一思想是鲁迅从早期的“立人”思想中概括出来的，是鲁迅一生所坚持的“宗旨”；其二，鲁迅后期思想发生转变，其根本原因便在此；其三，这一本

①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3、86页。

② 王富仁：《从“兴业”到“立人”——鲁迅早期的文化思想》，《灵魂的挣扎》，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③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原思想于“当下建设小康生活、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这篇文章呼吁向“鲁迅本体”还原，其还原的眼光却同样囿于寻出路和找方向的旧思路。^①

在鲁迅思想中“寻出路，找方向”，意在勾勒出鲁迅的清晰、了然的思想轮廓。而与此相对照，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的另一个路向是剖析鲁迅“思想”/“内心世界”/“生命哲学”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王晓明写于1985年的《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论鲁迅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王晓明直认鲁迅“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所谓“最苦痛的灵魂”指的便是鲁迅内心里的矛盾。钱理群、王乾坤合撰的《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一文也是一开篇便强调鲁迅思想的“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特点。其他诸如汪晖《反抗绝望》、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等等，或分析作品，或传写人生，都倾向于从矛盾、冲突的角度展开对鲁迅的讨论。

这一类研究宣告了描绘鲁迅思想的清晰图像的不可能，也向全面地理解鲁迅作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就是这一类研究，其视野中的鲁迅的矛盾仍旧可以归结为“出路”的矛盾。研究者们对“鲁迅思想”的探讨仍旧没有离开“找出路”的基本框架。萦绕于一代研究者思考中的“鲁迅是谁”的难题与寻找出路的历史道德承担紧密相关。

这也是研究者们纷纷以鲁迅对“大众”与“个人”的态度和意见的矛盾来建构“鲁迅思想”的根本原因。因为，正是“出路”把“个人”与“大众”连接起来——“大众”因“出路”而有意义，“出路”亦是“个人”走向“大众”的必由之路。王晓明的两段论述很有代表性——

他极力说服自己去依靠大众，却偏偏看见他们张着嘴的麻

^① 参见张梦阳《“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本原思想探究》，《城市文艺》第1卷第9期（香港：2006），第17页。

木相；他想用文章去唤醒他们，却越来越怀疑他们并非是真的昏睡。这就好比已经上了路，却发现很可能方向不对，到不了目的地，他怎么办？

.....

鲁迅是为了继续走路才找来“任个人”思想的手杖的，可现在，他那客观身份和主观心境的矛盾竟表现为这样一种危险的警告：倘若他一味纵容那些撒旦式的情绪，就势必要坠入绥惠略夫式的绝境。……但是，鲁迅那个时代的黑暗却是不可饶恕的，它使鲁迅彷徨得太久了，他似乎找到了出路，却发现前面依然是乱木和杂丛，不得不朝别的方向再作探索——就在这种充满惶惑而屡屡徒劳的探索当中，他耗费了多少天才的创造力！^①

前面讲到的《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一文也同样如此。该文认为鲁迅的思想是一种人学，其矛盾源于他从“类”的方面和从“个”的方面对人的本质的两种把握方式的不同；在前者，鲁迅秉持的是“生命进化的乐观主义”，一变换到后者，鲁迅就坠入了“人的一切挣扎终不免毁灭的深刻绝望”，而鲁迅正是在“绝望与希望”的矛盾与挣扎中选择着、调整着自己的生存态度与人生之路。^②在事实上，前者所谓“类”的方面指的就是“大众”的立场；而后者对应的正是“个人”的角度。因“出路”而看到矛盾，又在“大众”与“个人”的“矛盾”中寻找“出路”，正是这两篇文章描述“鲁迅思想”的基本框架。

① 转引自孙郁、黄乔生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302页，

② 同上书，第279~280页。

三

然而，鲁迅一以贯之的态度是，他无从做导师，也写不出药方。

鲁迅认为他自己没有本领来指导青年，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自己的人生路也在寻求中，而且这寻求也只是“乱闯”；其二，他的对于社会的战斗和反抗，不是希望光明的到来，而是与黑暗捣乱。

既然个人的道路尚在寻求中，“救世的药方”鲁迅也声明写不出来。其早期申明这一意见的作品就很多。1923年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鲁迅说，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便不肯动弹。但是这鞭子从哪里来，怎么地来，他也不能确切地知道。1925年与许广平讨论改革国民的坏根性，鲁迅更直叹“无从措手”。1926年，鲁迅还声言，他自己的杂文，也是“说自己的话”，是“党同伐异的”，并未“寻到公理或正义”。^① 回应1927年“革命文学家”之所谓“保障最后的胜利”，鲁迅说，正是因为黑暗和没有出路，才要革命。倘要保证了“出路”之后才去革命，那就连投机家都不如。^② 1928年，在一封公开的回信里，鲁迅承认，正如有人指定的那样，他的作品没有出路的暗示，而那些人所倡言的出路也不过旧小说中常有的“中状元”的老路而已。^③

晚年，鲁迅仍旧坚持这一写作态度。1932年沙汀和艾芜写信向鲁迅请教的两个问题——小资产阶级题材究竟对时代有没有意义，要不要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针对的就

① 参见鲁迅《新的世故》，《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下引《鲁迅全集》均出自这一版本，不再另注。

② 参见鲁迅《铲共大观》，《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06页。

③ 参见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第97页。

是当时暗示“出路”的革命文学的潮流。鲁迅的回答是，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硬添一条出路——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1934年10月在给萧军的回信中，鲁迅几乎重复了上述意见——“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写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①

1933年，文学界有关“题材积极性”的讨论，焦点也在“出路”问题上。鲁迅援引恩格斯的一段话予以回应——“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② 这同一年，与人谈起为什么没有新作小说时，鲁迅坦言，因为“多年和社会隔绝”，自己不在“漩涡中心”，所以写不出好作品来。^③ 这不在“漩涡中心”、“和社会隔绝”的言外之意——他无法写出肩负着指示出路之重任的作品来。

四

鲁迅不提供出路，也写不出药方，鲁迅的意义何在？

研究者薛毅曾指出，鲁迅杂文是“反声音”，是一种关于“声音”的“声音”，是“无声的中国”中少数者“声音”的“声音”；鲁迅通过杂文写作“揭示这少数人声音背后的意图，它与权力的关系，撕破这种声音构成的意识形态网络，使之无法有效地行使它的

① 鲁迅：《341009③致萧军》，《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32页。

② 鲁迅：《关于翻译》，《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54页。

③ 参见鲁迅《331105致姚克》，《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56页。

能力”。^① 薛毅讨论的是鲁迅的杂文，在事实上，对“声音”的解剖是鲁迅全部写作的宗旨所在，倘说有所谓的“鲁迅思想”，这思想和思想的意义就在此。

“声音”就是“表达”（representation）。鲁迅的写作是对“表达”这一文化行为的解剖，是关于“表达”的“表达”。^② 鲁迅的写作/“思想”集中于对表达的阐述：鲁迅一面倡导“心声的表达”，分析这表达于个人及民族的作用；一面解剖权力者声音的实际所指和生产机制，探讨“表达者的立场”对“表达”的制约，揭示知识者共同面临的“表达的困难”。

我们从鲁迅对人类特别是早期人类的“表达”行为的一般性特征的论述说起。

鲁迅写到原始人的表情达意。鲁迅以为，原始人最初的表达工具是“声音”，仰仗这声音就产生了“杭育杭育派”——那最早大喊“杭育杭育”的人堪称一位创作家，他发出了别人想发出但是不能或尚未发出的声音；而其他入又认可这一表达方式，并争相效仿，就相当于出版了。^③ 声音之后，表达工具的进一步演进，就有了“言辞”，即说话。鲁迅推崇的神话就是这说话的结果。鲁迅认为，神话是初民驰骋和恣肆其想象与智慧的结果，它记录了太古之民丰富和奇特的“神思”，作为后人当“惊异瑰大之”。^④ 至于文字的形成，鲁迅认为是“岁时”和“众手”的功劳。^⑤ 鲁迅援引了一个例子解说这文字的由来。这就是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Altamira）洞里的野牛。鲁迅说，在原始社会，这画便是一个奇迹。人们看到

① 参见薛毅《反抗者的文学——论鲁迅的杂文写作》，http://www.chinese-thought.org/whyj/005685_3.htm。

② 黄子平 2007 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演讲《鲁迅与文化研究》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演讲稿载《现代中国》第 10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5～169 页。

③ 参见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94 页。

④ 参见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第 30 页。

⑤ 参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第 344 页。